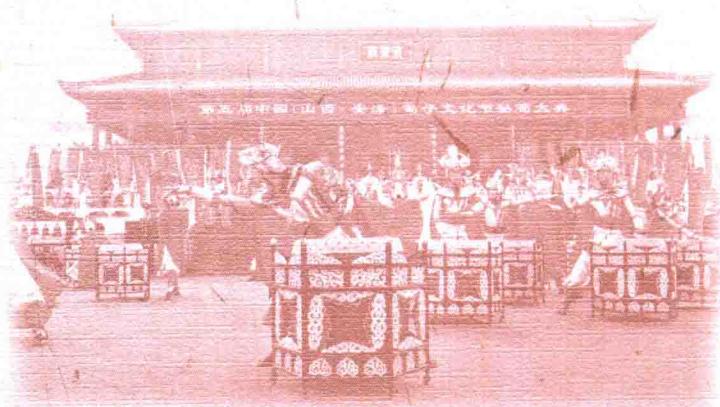


毛巧晖 著

记忆、表演与传统

——当代文化语境下安泽文化寻踪

Memory, Performance and Tradition:
the Pursuit of Anz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毛巧晖 著

记忆、表演与传统

——当代文化语境下安泽文化寻踪

Memory, Performance and Tradition:
the Pursuit of Anz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表演与传统：当代文化语境下安泽文化寻踪 / 毛巧晖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
(安泽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7882 - 9

I. ①记… II. ①毛… III. ①文化史—研究—安泽县
IV. ①K29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18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307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山西师范大学荀子学院资助

序

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其文化面貌千姿百态。东部与西部不同，南人与北人有异。若按照通常的办法，将中国文化进行较为详细的区域性划分，则有燕赵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关中文化、关东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草原文化、岭南文化、青藏文化、巴蜀文化、滇云文化、西域文化、台湾文化等。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和文化传统，同时，也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使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异、转型和创新。对于各个区域文化的研究愈深入，了解愈详细，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普遍性格的认识也就愈清晰。

事实上，某种区域文化内还包含许多次级区域文化，县域文化即属此类。它是指在县域一级行政区划内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其内容包括该县域人们生产生活的样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俗风情、语言、信仰、艺术、习惯等。如若对这些诸多的县域文化的过去和现在逐一进行梳理，探索它们的共性与个性，将是对其所在的区域文化以及中华学术研究的扎实推进和整体认识的不断深入。同时，对县域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安泽文化研究便是一种探索。探索始于 2006 年鄙人应邀参加安泽首届荀子文化节高层论坛。自那时起，同安泽有了不解之缘。荀子文化节共举办了七届，鄙人参加了六次，并协助安泽县委县政府邀请国内外学者与会，整理论文资料。其间有两件事情感受深刻。一是，2008 年下半年同王福才先生带领专门史和戏曲文物研究所的部分研究生走遍安泽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寻找碑碣，清洗传拓，碑文抄录、校对标点、摄影整理，编辑形成《安泽碑碣》初稿交付安泽县政府。二是，2009 年山西师

2 记忆、表演与传统

范大学与安泽共建荀子学院的建立。交往不断进行，了解随之加深。于是，便对安泽县域文化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安泽文化研究丛书》的编撰即是初步尝试。

本套丛书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拟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安泽碑刻与社会。主要对安泽现存碑刻进行梳理、分类、统计，直观反映碑刻在安泽县域的基本状况，并通过对碑刻资料的研究，揭示安泽县域的宗教信仰、民间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等等。

二是安泽方言与社会。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它可以反映出各个地域特有的人情风貌、风俗心理及艺术风味。可以说，没有方言，地方文化就失去其支撑。安泽是一个典型的移入民栖息地，其移民类型和特点极具复杂性和典型性。本套丛书将对安泽的土著方言、府城新话及移民语言进行实录分析，从语言角度透视安泽特有的语言现象和文化内容，探寻语言在文化身份的建构和维护中起的重要作用，以期为安泽县域文化研究添上一份独有的风采。

三是安泽民俗与社会。我们首先选取了从 2006 年安泽开始举办的“荀子文化节”，它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建构出来的文化现象，但是其在安泽以外的地域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当下已成为安泽的一张文化名片。对于这种地域文化符号重构的描述与理论阐释，可以折射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以后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另外，黑虎信仰是安泽地方信仰系统中较为突出的点，在安泽分布着大大小小数量很多的黑虎庙，是当地民间信仰的典型代表。从民间与官方两个层面阐释黑虎信仰，有利于对安泽民间信仰的理解与民众生存经验的认知。最后对安泽当地民间文艺中最有影响的唐城花灯秧歌与和川道情进行阐释，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是安泽革命斗争史实。安泽是太岳革命根据地主要县份之一，也是开辟岳南革命根据地西南门户和前哨阵地，在军事上政治上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当年曾有“晋冀鲁豫小边区”之称。在安泽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安泽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壮丽篇章。太岳军区司令部、太岳行政公署、太岳军区政治部、太岳兵工厂、太岳新华日报印刷厂都曾驻扎于此，还留下了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赓、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活战斗的足迹。我们对此进行梳理研究，将是

对革命英烈的崇敬与纪念，也是对今人的教育和激励！

既是尝试，则疏漏与不足便在所难免。期望读者批评指正，期望县域文化研究蓬勃开展！

张有智

2015年4月12日

目 录

导言	(1)
一 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	(1)
二 民俗的地域性与典型民俗	(10)
三 基本思路与基本框架	(12)
第一章 安泽人文地理概况	(14)
一 安泽历史沿革	(14)
二 安泽自然地理环境	(23)
三 安泽的民族与人口	(30)
四 安泽的经济与交通	(38)
第二章 安泽民俗文化	(44)
一 饮食民俗	(44)
二 岁时节令民俗	(49)
三 人生仪礼	(57)
四 寺庙与民间信仰	(64)
第三章 社会变迁与安泽移入民民俗调查	(72)
一 安泽府城镇移民村社会生态概述	(73)
二 安泽移民原因和社会身份	(77)
三 安泽府城镇民众的移民记忆	(85)
四 安泽移入民社会重构与民俗记忆	(90)
第四章 地域文化符号的重构	
——“荀子文化节”活动考察	(99)
一 国家话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99)

2 记忆、表演与传统

二 安泽荀子故里史料梳理	(102)
三 安泽口述传统中的荀子	(106)
四 荀子文化节——历史与民众记忆的互构	(115)
五 非物质文化语境中权威话语的导引与建构意义	(120)

第五章 民间信仰与官方意识

——安泽黑虎信仰的文化阐释	(122)
一 安泽黑虎庙概述	(122)
二 中国古代的虎神信仰	(127)
三 山西人文地域环境与黑虎信仰	(130)
四 多神共存的黑虎庙	(131)
五 安泽黑虎庙与民众生活	(134)

第六章 传统与变迁：安泽唐城镇花灯秧歌

一 唐城镇花灯秧歌的背景探源	(142)
二 唐城镇花灯秧歌的基本构成	(145)
三 唐城镇花灯秧歌的表演程式	(150)
四 唐城镇花灯秧歌的传承状况	(156)

第七章 文化建构与文化传承

——兼论和川镇道情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162)
一 安泽和川镇概貌	(163)
二 道情的历史发展与演化	(165)
三 和川镇道情的建构与文化记忆	(171)
四 和川镇道情代表性艺人表演与传承	(173)
五 和川镇道情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	(176)
附：和川镇道情艺人访谈资料	(179)

附录

一 朱婵媛的调查日志	(223)
二 杨喜凤的调查日志	(231)
三 锥宁的调查日志	(240)

目 录 3

四 段慧丽的调查日志	(245)
五 王俊苗的调查日志	(248)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1)

导　　言

安泽县古称岳阳，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地区东北部，总面积1967.3平方公里。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先民定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朝代更迭，辖区几经变更，分合无常。隋唐、金元时期，它占据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明清两朝至今，它处于山西南部到山西东南部的交通要塞。现在，安泽在临汾市属于一个人口较少的县，但是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除了近几年因为政府的大力宣传而打造的大思想家“荀子故里”外，它的民俗文化绚丽多姿、错综复杂，值得深入研究。

一 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

民俗学是以民俗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① 民俗学这一概念不是中国固有的，但对于其研究对象——民俗的重视，中国则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民间文艺学一般用以指“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有时也兼及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等学术活动”^②。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关系密切，他们的研究对象有重合，民间文学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共同研究对象（见图0-1）。

^①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②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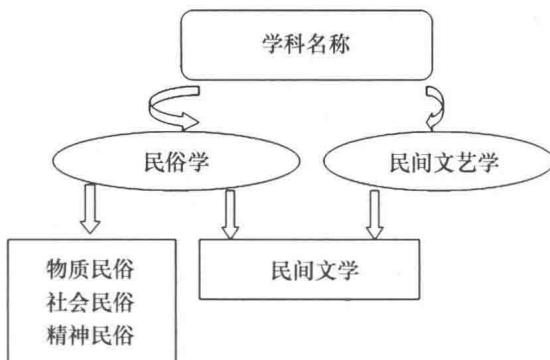


图 0-1

先秦时期，正统的上层文化体系还没有形成，无所谓民间风俗、上层文化，它们之间彼此交融在一起，所以孔子提出了“礼失求诸野”；删定《诗》三百篇，将风、雅、颂置于同一层面；并且穿朝服观看傩戏。到汉代，整个社会“独尊儒术”，上层文化形成体系，“统治阶级的文化就是社会的统治文化”（马克思语），民间风俗处于社会的边缘。自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民间风俗发展出现三个高峰期，即两宋、晚明以及清朝中后期。两宋时期政治控制松弛，城市经济迅速发展，而且人身依附关系松动，这些都为民俗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宋代的讲史、说浑话、戏曲歌舞极为繁荣。晚明时期虽然政治黑暗腐朽，但是思想控制相对松弛，而且教育水平提高，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都导致思想界的变革，学术界形成抨击“伪道学”，肯定“私欲”，张扬自由个性的局面。民间风俗被重新审视，文人在其中发现了与自己主张相合的理念，这样就有大量的文人开始宣传、搜集和加工民间风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冯梦龙。他出版了民歌、民间故事、谜语和笑话，认为“只有假诗文，没有假山歌”“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①在文人学者的宣传下，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热衷民间风俗的热潮。清朝中后期，社会处于转型期，同样出现了一个关注民间风俗的高潮，但是它与历史上其他时期有着显著的差别。清代在中国文化史中占着很灿烂的一

^① (明) 冯梦龙:《山歌·叙》，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页，因此谈论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很多人喜欢“从晚清说起”^①，民俗学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中提道：“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的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②晚清时期是科学民俗学形成的酝酿时期。刘锡诚也明确提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滥觞，实际上确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早，应在晚清末年。”^③

中国民俗学从民间文学的研究开始起步，正如钟敬文指出的中国引进民俗学是“从文学切入”^④，日本民俗学家直江广治强调：“中国民俗学的诞生是和文艺紧紧相连的。”^⑤这一特征与世界民俗学学科的兴起和发展相吻合，德国和法国的民俗研究也是从民间文学开展起来的。这种倾向的结果之一就是“民俗学范畴内逐渐出现以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为主的趋向”^⑥。

从学科体系归属上，民间文学在不同国家情形不同。在西方，民间文学归属于民俗学学科，但是不同的国家具体定位差异很大。德国民俗学“被视为广义上的民间诗学”；俄苏则指“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英国民俗学“关心的是民俗的社会功能，即使研究民间口头创作也只对其中的古代文学遗留物感兴趣”；法国介于两大传统之间。^⑦也就是说，民间文学在德、俄苏、英、法等国家民俗学的学科体系中所处位置及意义不同。

晚清时期，西方新思想的输入主要是转道日本，中国“民俗学”一词直接译自日语。日本民俗学来自西方，但是它的一些理论，却是日本学者在自己实践中形成的，具有自己的特色，它从社会科切入，包含民间文学部分。这样民俗学作为新兴学科，它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可以直接从西方

^① 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 页。

^②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

^③ 刘锡诚：《民俗百年话题》，载《民俗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④ 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和体会》，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6 期。

^⑤ [日] 直江广治：《中国民俗学·序》，林怀卿译，台湾世一书局印行 1970 年版。

^⑥ 陈勤建：《20 世纪中日民俗学学术倾向及前瞻》，载《民俗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⑦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6、441、429 页。

引进，更无可依托的学术传统。中国民俗学的形成和发展受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影响最大。当时翻译的理论著作中英国班恩女士（Charlotte Burne）的《民俗学问题格》^①、柯克士女士（Marian Cox）的《民俗学浅说》^②等最为有名。弗雷泽（James Frazer）、安德鲁·朗（Andrew Lang）等英国人类学派代表人物对周作人、江绍原、茅盾等的巨大影响更是学术史常识。另外就是受到美国民俗学的影响，例如美国学者詹姆逊（R. D. Jameson），在清华大学任教讲述民俗学课程，后来他将讲义集结成册，出版了《中国民俗学三讲》。^③从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学界学科指称中运用“民俗学”术语非常普遍，它与folklore对译，与英国的民俗学思想一致；而民间文艺学的称谓混乱，学术空间也相对狭小，仅限于民间文学。20世纪90年代，学科规划中又将民间文学完全纳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民间文艺学也失去了学科的独立性。这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人论述相同，那一时期学人也是将民间文学视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所以在下文叙述中，民间文艺学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基本上直接使用民俗学指称。

民俗学特殊的研究对象，使得它与社会思潮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如丹·本·阿莫斯所说：“……他（按：指吉乌塞普·科奇亚拉，《欧洲民俗学史》的作者）把民俗学的观念和内容当作欧洲思想史的内在部分”^④，可见民俗学与思想史、思潮的内在关系。赵世瑜强调：“不仅把民俗学视为一门学科，而将其当作一种思想、一种社会思潮……”^⑤因此，民间文艺系与民俗学一样，与社会思潮紧密联系。

在中国内部文化思想演变的同时，西方的思想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侵入以及中国学者的“放眼看世界”逐渐进入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种思潮与学派通过翻译涌入中国，进化论、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经验自然主义等都被引进。思想文化界内外交合的变革，其目的都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核心主题就是民族的生存和兴盛。在这个历史语境

^① 杨成志译：《民俗学问题格》，原为班恩女士《民俗学手册》中的两个附录的选译，1928年6月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出版。

^② [英]柯克士：《民俗学浅说》，郑振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③ [美]詹姆逊：《中国民俗学三讲》，北平三友书社1932年版。

^④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⑤ 同上书，第14页。

中，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声音，那就是民间。

清朝后期，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近代文化时，表现出了对“民”与“民间”的关注，除了受到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外，还有内源性的因素。他们在引进和接纳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采诗”的影响与规范，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了平民意识，文学上则开始重视、推崇“白话文学”“平民文学”。

清末政治思想变革，关注“民间”成为一种思潮，在这种政治思潮的影响下，文学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对文学语言的态度，主张用俗语著作，提倡具有通俗性的文学种类，如小说、戏剧；公开提出了文学为政治和社会服务的主张（当时“政治小说”流行，并且产生了很多这类作品），特别是对于民间文学的注意，是当时学术界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仿作民谣、俗歌，成为当时的一股巨流，并且将书本文学的起源追溯到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歌谣）。这种观念是近代才有的，它是在进化论影响下形成的文学进化观。清末很多学者处于这一旋涡之中，从改良派到革命派，都意识到了“民间”。

清代只是现代意义上民俗学酝酿时期，但是由于中国对于民间文学关注的历史传统，以及当时特殊的历史境遇，知识分子卷入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洪流中，关注民间、民众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而这恰好符合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主体，因此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从非学术意义上关注着民间。他们是时代的先锋，处于民族革命倡导者的位置，关注民间，向民众讲述自己的思想，鼓动民众革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创作，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向民众宣扬革命，希望得到民众的响应。因此，当时的学者虽然没有从学术意义上创建民俗学，但是显而易见，他们都在非学科的意义上为民俗学的创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同时打下了民间文艺学的根基。

1917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纪念前后，在校长蔡元培的号召下，计划进行多种纪念活动，那时发表了歌谣采集规约，拟刊行歌谣即民谣总集和选集两种，作为其中活动之一。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在蔡元培特用《校长启事》公告的支持下，刊登了《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简章》，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中国民俗学产生的标志。民俗学诞生以后，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加入，但缺乏专业人士，出现

“热闹有余而专业性则显不足”^①的状况。这就形成了作为运动的民间文艺学之兴盛，但学术的推进则显苍白。在西化大潮中，民俗学理论零碎、片断地被引进，学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点进行着中国式的阐释和转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最初参与民俗学运动的学人，都有着深厚的国学传统，再加上民俗学伴随着新文学运动诞生，在他们接受和发展民俗学中，自然而然落足于民间文学。研究方法上则是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上吸纳了西方的实证主义，资料收集成为基本问题。那一时期随着一批欧美留学的专业人士的回国，欧美的民俗学理论得以系统化引进，但他们的研究以资料收集为主旨，目的只是进行资料系统的储备，这极大影响了民俗学理论的推进与深化。所以这一时期民俗学学术研究并没有大的提高，当然不能否认局部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理论的提升。

民间文艺学在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它的学术发展与民俗学轨迹几乎是重合的，如胡愈之《论民间文学》与1933年编纂、出版于上海的《辞源》都是将民间文学与folklore对译，学科名称更多使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并未成为一个独立领域。民间文艺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新的文艺政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解放区的民间文学研究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指导下发展，逐步显现出与之前和其他两个区域民俗学的差异。解放区的民间文学研究完全纳入文学轨道，在理论研究方面，注重探析它作为文艺的一部分，重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革命战争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同时利用陕北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料，进行改编和再创作，掀起了新秧歌运动、新说书运动与文人民间文艺（或称通俗文艺）创作的浪潮，这些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唤起民众的民族情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是在这一时期以及特殊的地域环境中，逐步奠定了民间文艺学的独立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的民间文艺学思想推广到全国，作为学科的民间文艺学诞生，民间文艺学进行了重新建构，完成了从作为运动的民间文学向新民间文艺学的转

^① Chao Wei-pang, *Modern Chinese Folklore Investigation* 中提道：“主要缺点是，那些民俗学研究工作的创始者们没有一个人充分熟悉民俗学这门科学的性质、理论和方法……”原载辅仁大学《民俗学志》1942年第1期，转自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民间文艺学沿着文艺学模式推进，基本上跟随作家文艺学的轨迹，没有凸显自己的文学性特质。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俗学的发展受到重视，钟敬文认为民俗学是人文科学的一种。他专文论述了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关系，具体观点如下：

首先，民间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学理论，是民俗志和民俗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次，民俗学可以作为人文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史的手段学——方法学，同样它也可以作为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学。最后，现在研究民间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民俗志和民俗学知识。^①

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术名词的差异。作为学科的名称，他的提法是民间文艺学，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他所述民间文学属于民俗学，只是在论述它作为民俗学的一种研究对象，民俗学作为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学。在这里需要明确民间文学研究与民间文艺学具有不同的内涵，民间文学可以作为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在钟敬文的论述中，他还强调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并列于学科体系之中。只是在关于民俗学与文化学交叉、并融的关系中，他将民间文艺学置于民俗学之后，而且对其学科归属语焉不详。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文化热”的盛行，钟敬文积极推动民俗学进入文化学的研究与讨论，他将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大体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民间文学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民间文学是民俗人际关系的媒介，是许多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民俗传承。在述及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民俗学有自己的丰富内涵，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并列，是独立的学科，而对民间文艺学的归属及其学科特性则无明确阐述。这样，在他阐述民俗学思想的过程中，民间文艺学逐步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民间文艺学的学科独立性渐趋消解，同时因为一再强调民间文学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学界渐趋模糊民间文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差异，最后将民间文学从文学领域剥离。随着“文化热”的消失，民俗的文化学意义不再被提起与强调，但钟敬文在这一历史语境中的民俗

^① 参见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291页。